

國家圖書館

自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編號：

年 度：102 年度

執行期限：

計畫名稱：胡適先生與國立中央圖書館之關係

研究人員：黃文德 張圍東 宋美珍 陳麗玲 唐申蓉

本報告是否可公開發表：本研究非經作者同意，請勿引用

目 次

壹、前言	1
貳、抗戰初期胡適與央圖古籍赴美策略	2
參、胡適對於央圖館藏古籍的存疑與考訂	5
肆、胡適對於央圖的經費援助與贊助	10
伍、結論	11
參考資料	13

摘 要

胡適與國立中央圖書館的關係，基本上可以說是建立在胡適與蔣復璁兩個人的私人情誼上。從 1933 至 1962 年，胡適之於央圖，其貢獻匪淺，如建議購置章勁宇所藏「清代學人手迹」、聯繫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USA）協助善本珍籍運美避禍、戰後援助央圖在臺復館籌建館舍、爭取「中華文化教育基金」(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等公私機關補助經費，而更重要的是，透過胡適的古籍版本研究與跨國比對，讓渡海來臺珍籍價值能受到國際學界重視；另一方面，央圖之於胡氏，透過古籍借閱，除了讓他延續在大陸時期有關《水經注》、清代學者戴震、以及佛學研究，也提供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者得以調閱央圖古籍，進行研究。甚至在某些程度上，早期蔣復璁開放央圖館藏供臺灣出版社印製古籍，也可能是受到胡適之鼓勵。今年為胡氏逝世 51 周年，為紀念先生與央圖本館這段互動情緣，因此利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典藏之檔案與國家圖書館館史文獻，一方面建構胡適與央圖這段有趣的知識探索過程，同時釐清胡適整理國故，考訂古籍所留下的線索，鑑往知來。

關鍵詞：胡適、國立中央圖書館

胡適先生與國立中央圖書館之關係

壹、前言

1919年秋天的下午，在中國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教室裡，來自浙江海寧的蔣復璁仰望課堂上那位剛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返國不到兩年的年輕博士胡適先生講授中國哲學史，師生孺慕之情，至半世紀以後依然令人動容。當時胡適不僅是大學老師，也是名滿天下的文學改革運動領袖，而蔣復璁對胡氏中國哲學史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卻是那未完成的講義。1930年，蔣氏獲得公費補助，得以前往德國攻讀哲學學位，後轉往柏林圖書學院就讀，並在圖書館實習。1930至1932年留學期間，恰逢德國普魯士科學院(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漢學教授弗蘭克博士(Dr. Otto Franke)希望找到一位中國學者任通訊員，蔣氏原推荐章太炎，後弗蘭克博士舉薦胡氏擔任，促成日後胡適與歐陸漢學界進密關係。¹ 1933年4月8日，蔣復璁奉教育部令，擔任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在文化教育界日趨活躍。這對師生之關係也因彼此擔任職務不同，隨著國立中央圖書館建館、復館而關係密切。

從1933至1962年，胡適之於央圖，其貢獻匪淺，如建議購置章勁宇所藏「清代學人手迹」、聯繫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 USA)協助善本珍籍運美避禍、戰後援助央圖在臺復館籌建館舍、爭取「中華文化教育基金」(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等公私機關補助經費，而更重要的是，透過胡適的古籍版本研究與跨國比對，讓渡海來臺珍籍價值能受到國際學界重視；另一方面，央圖之於胡氏，透過古籍借閱，除了讓他延續在大陸時期有關《水經注》、清代學者戴震、以及佛學研究，也提供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者得以調閱央圖古籍，進行研究。甚至在某些程度上，早期蔣復璁開放央圖館藏供臺灣出版社印製古籍，也可能是受到胡適之鼓勵。今年為胡氏逝世51周年，為紀念先生與央圖本館這段互動情緣，因此利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典藏之檔案與國家圖書館

¹ 蔣復璁，〈追憶胡適之先生〉，《文星》9:5=53(1962)，頁9。

館史文獻，一方面建構胡適與央圖這段有趣的知識探索過程，同時釐清胡適整理國故，考訂古籍所留下的線索，鑑往知來。

貳、抗戰初期胡適與央圖古籍赴美策略

1937年中華民國與日本之間國際關係惡化，爲了加強對美國政府聯繫工作，當時在廬山進行軍官團訓練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透過蔣夢麟聯繫胡適，表達希望能協助政府外交，² 蔣氏甚至又透過學者出身，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驊要邀請胡適聽取力行社有關日本情報之報告。³ 7月7日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全面爆發，當時國民政府已準備西遷，招商局江船奉令支援漢口、南京與鎮江之間航線。對於對日戰爭，原本主張對日交涉的胡適，寫信給蔣中正，認爲對日於戰前「應再做一次和平努力」。⁴ 8月13日日軍進攻淞滬地區。8月15日首都南京遭遇空襲。爲了爭取國際輿論支持，軍蔣氏於8月19日要求胡適即日前往美國爭取美方對中國的支持。翌年9月17日，胡適奉派擔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至到1942年9月8日。

胡適在擔任駐美大使任內，對於央圖最爲密切的協助，當屬1942年夏季與籌畫古籍赴美。1937年日軍空襲南京後，當時仍在後籌備的央圖迅速將重要圖書封存262箱，運送位於南京故宮博物院新建庫房妥藏，至11月奉令西遷，自其中提出重要圖書130箱，運送南京下關碼頭；11月23日押運圖書至武昌，暫寄存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另設辦事處於積玉橋聖安得烈堂。一個月後，南京淪陷，籌備處留存在首都之財產全部遭損。抗戰初期，籌備處主任蔣復璁先生見江南藏書樓古籍散落，恐流落異域，於是與鄭振鐸等人於1940年至1941年期間秘密籌組「文獻保存同志會」，⁵ 並在國民政府與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Returned British Boxer Indemnity Commission)的支持下，獲得經費支持，展開大規模的善本古籍蒐購行動，最後共購得40餘萬冊善本古籍。雖然只有短短差不多兩年時間，央圖卻適時購得古籍4,864部，合計48,000多冊，實可稱豐碩，這可

² 「蔣中正電蔣夢麟」，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檔案」，1937年6月15日，典藏號002-080200-00279-074。

³ 「蔣中正電朱家驊」，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檔案」，1937年6月15日，典藏號002-060100-00123-101。

⁴ 「胡適致蔣中正驢」，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檔案」，1937年8月6日，典藏號002-080200-00622-002。

⁵ 其他重要人士還包括葉恭綽、徐鴻寶、張壽鏞、何炳松、張元濟，以及張鳳舉。

能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際間最大規模的搶救文化資產秘密行動。

由於央圖在上海與香港兩地購置書籍，僅宋元刊本、明清精本、明清稿本、精校鈔本、明刊本、清刊精品、罕見本，清人及近人稿本、鈔校本在 1940 年底已達 3 千餘部，2 萬 9 千餘冊。⁶ 爲恐日軍擴大戰事，影響滬港兩地存放古籍安全。因此，在 11 月初，蔣復璁向教育部報告，上海美僑已有撤離之跡象，太平洋戰事岌岌可危，故英庚款董事會建議央圖將購藏古籍比照西北科學考察團漢簡之案例，將古籍移存美國。所謂西北科學考察團案例，係指 1937 年抗戰爆發後，中國學界爲保存居延漢簡，因此在徐森玉的聯繫下，獲得香港大學校長蔣夢麟與教授許地山的支持，於是將考古所得分批由北平移往香港大學寄存。1940 年，東亞國際局勢緊張，這批漢簡又在駐美大學胡適的協助下由香港運往美國本土安置。本案參與者包括徐森玉、許地山同時也是協助央圖古籍在滬港兩地存放的參與者。兩案在文獻價值與參與人事，有諸多相同之處，蔣氏或許因此受到啓發，爲此他很快就與胡適大使聯繫，並向教育部報告擬計畫由之江大學（Hangchow University）秘書藉返回美國之便，將古籍運送到舊金山總領事館。但他也認爲本案茲事體大，移或不移，皆有風險。⁷ 因此，關於央圖購藏古籍移地安置案，1941 年初蔣復璁先後請何炳松、徐森玉等人出面聯繫之江大學秘書，希望實踐圖書移存美國，但無結果。⁸

與古籍移存美國案同時進行的還包括以空運或水路方式運往重慶。就空運而言，1941 年 7 月 31 日，由香港以空運方式運送到重慶的 82 種精品古籍，曾滯留桂林 40 餘天，但這似乎讓蔣復璁等人更質疑空運的風險，加上香港與重慶之間空運已逐漸受到戰事影響。就水運而言，係計畫以水運方式將古籍移存至瀘州（四川省江津縣），也就是央圖在四川圖書的疏散處，一度被提出。⁹ 惟水運方式曠日廢時，而且運費價格也大有問題。同年 10 月，經蔣復璁、鄭振鐸商議，鄭氏認爲關於貨運古籍一事，當以「運美爲最上策」。¹⁰ 於是，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的協助下，央圖古籍造冊並加蓋館藏章

⁶ 參見蘇精，〈抗戰時祕密蒐購淪陷區古籍始末〉，《傳記文學》35:5，頁 113-114。

⁷ 「蔣復璁函教育部」，1940 年 11 月 2 日，「國家圖書館館史文獻」，編號 A0329。

⁸ 「蔣復璁致文獻保存同志會（渝庚補第 892 號密件）」，依前後發文時間約在 1941 年上半年，「國家圖書館館史文獻」，編號 A0362。

⁹ 參見盧錦堂，〈劫餘玄覽幸遷來〉，收入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編，《搶救國家珍貴古籍八十種圖錄，1940-1941》（臺北：國家圖書館，2013 年），頁 27-29。

¹⁰ 「鄭振鐸致蔣復璁」，1941 年 10 月初，「國家圖書館館史文獻」，編號 0092-B0094。

完成之後，海運古籍赴美案再度被提出，而且也獲得胡適支持，並計畫於 12 月 6 日由美國輪船格蘭特總統號(President Grant)搭載自香港開出。但 2 天後，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攻香港，並掠奪香港大學。央圖對於這批原定上船赴美的圖書下落，全然無法掌握。翌年，1 月 6 日，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致國立中央圖書館電請聯繫胡適大使確認格蘭特總統號安全問題，¹¹ 但雙方都未獲駐美使館後續回覆。一直到 8 月 8 日中英庚款董事會才告知央圖，這批書籍可能為日本海軍「波部隊」運至東京，該會並建議央圖戰後可以依馮平山圖書館馬季明先生所存目錄索還或索賠損失。¹²

1941 年底央圖古籍運美移存最後雖因日軍入侵而未竟全功，而胡適也在 1942 年 9 月 8 日不再擔任駐美大使，但遭日軍劫掠之這批古籍最後仍為央圖所尋獲。1946 年 3 月底，國民政府為調查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掠奪文物與戰後求償問題，由教育部派員出席盟國對日委員會代表團會議。由於北京大學教授張鳳舉曾於戰時參與「文獻保存同志會」，熟悉央圖購置古籍，乃受命協助政府對日、美交涉，取回國家文獻，避免日本方面隱匿珍籍或遭美國視為戰利品，移存美國。自 1946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6 日期間，張氏由於精通日語與古籍鑑定，因此很快就取得駐日美軍總部的支持與日本古籍研究學者長澤規矩的重視，不到兩個月就自日本帝國圖書館順利取回 3 萬餘冊古籍，運至上海，納入央圖館藏。¹³

¹¹ 「蔣復璁函教育部」，1940 年 11 月 2 日，「國家圖書館館史文獻」，編號 A0329。

¹²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蔣復璁函教育部」，1942 年 8 月 8 日，「國家圖書館館史文獻」，編號 A0036-A0037。

¹³ 2012 年 11 月，張鳳舉先生哲嗣衍華先生，將其父親日記有關這段追所國寶的歷程捐贈國家圖書館。透過先生之私人日記，可以清楚發現他。過去有關這段歷史往往將王世襄視為主要交涉者，實際上王氏僅負責押運古籍返回國土。

參、胡適對於央圖館藏古籍的存疑與考訂

1919年，在胡適提倡新文化運動之後，在新/舊、傳統/現代思潮對峙風潮下，他陸續發表《新思潮的意義》、《論國故學-答毛子水》、《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等論著，揭開以現代學術研究方式整理國故。從1920年代開始，在教學、研究與論辯的過程中，他開始長期性的關注中國禪宗哲學、宋儒朱子學說、清代學術源流，包括戴震及其相關人物，以及由戴震研究延伸出的傳統地理學研究等議題。見其學術惟精惟一之具體表現。

那麼中央圖書館館藏資源與這位劃時代的學術巨擘的互動，又是如何建立起來？從胡適相關文獻中爬梳，自1946年到1961年期間，他曾與央圖館長蔣復璁進行多次書信往返，請蔣氏代為查詢，或到館閱覽，甚至請央圖提供多部珍籍外借，以便他進行研究，從胡適日記中曾提出之央圖館藏書籍包括何焯校《水經注》、戴氏手刪底稿本《直隸河渠書》、央圖購自章勁宇的「清代學人手迹」(內含戴震手札11封、孔洪谷1封、戴震子1封，計13封)、楊守敬撰《水經注疏》(附熊會貞遺言)、明嘉靖甲午(十三年, 1534年)吳郡黃省曾刊本《水經注》、宋寶祐元年(1253年)刊本《五燈會元》及明代刊本、明成化庚寅(六年, 1470年)婺源知縣韓儼刊本《晦庵先生語錄類要》、翻刻明弘治四年(1491年)南京國子監本《朱子語略》。在研究過程中，胡適並不單純只是研究者，他也扮演協助央圖購置珍籍手稿、鑑定版本、海外資料聯繫，以及以學術研究方式呈現央圖在臺典藏國故之角色。而能以一人之力量，同時兼具這些特殊角色與影響力，迄今仍僅胡適一人。以下擬利用胡適日記中有關央圖文獻版本研究考訂，追溯其如何於不疑處有疑，整理國故：

一、從《水經注》研究為戴震翻案到《直隸河渠書》作者考訂

胡適研究《水經注》源起於他在1942年自駐美大使卸任以後，注意到清史研究孟森、王國維對於清儒戴震校勘《水經注》是否涉及剽竊抄襲清人趙一清之學術公案。胡適除了閱讀王氏撰《書戴校水經注後》，在1943年11月初獲得王重民，〈跋趙一清校本《水經注》兼論戴趙全趙兩公案〉一文後，胡氏曾取武英殿聚珍本《水經注》、《戴東原集》、《鮎埼亭集》、《觀堂集林》及《別集》，試覆勘此案後，他提筆寫信給王重民，表達他對於：「此案情節太離奇，而王國維、孟森諸公攻擊戴震太過，頗有志重審此案。」

¹⁴ 此後，胡適開始注意到圖書館不同版本。如 1946 年 10 月 25 日應央圖蔣復璁館長之邀請，與京滬藏書家尹石公前往閱覽清代何焯校閱之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西楚李長庚刊本《水經注箋》。胡適以為何校本之價值當在朱謀 本之上。¹⁵ 在鑑定古籍的過程中，胡適除了運用稿本互證，也注意到印記與目錄特徵等問題。為了探詢各類版本，胡適有時向書商借閱，1947 年 3 月 11 日，向商務印書館借來附有熊會貞遺書的楊守敬《水經注疏》校本。¹⁶ 另外，胡適也蒐購有關《水經注》古籍，如同月 27 日，購得來薰閣陳濟川所藏黃省曾嘉靖十三年《水經注》刻本。除了宋元刻本外，凡市面流通之《水經注》的刻本，他「全收得了」。¹⁷ 翌年，胡適總結編各類版本，編印《水經注版本四十種展覽目錄》由北京大學出版。

執著於《水經注》校勘的胡適，在 1948 年初步掌握各類版本後，開始探索戴震書寫有關地理學之論著，1948 年 9 月 18 日，他先是借得國立編譯館所藏熊會貞《水經注疏要刪再續補》，又借得央圖所藏《直隸河渠書》稿本廿五冊。¹⁸ 前者為熊氏之子以千元代價加上熊氏《水經注》稿本四十卷賣給國立編譯館。¹⁹ 熊氏《水經注》稿本後來因不明原因轉為央圖所典藏，今館藏編號為 03970。胡適對於這個版本非常感到興趣，他比對 1940 年 1 月 29 日《時事新報》重慶版、《學燈》第 70 期及 1943 年 10 月出版之《中國學報》所載有異同，認為此版應是原本。至 1951 年，11 月 27 日，他細讀熊氏為《水經注》所批校文字，因而認定可分成四個部分，即遺言前題記三條、遺言後一葉、以及遺言後的又一葉。²⁰

¹⁴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冊 8（臺北：聯經出版社，2004 年），頁 183。

¹⁵ 原文所寫書名為「何焯校《水經注》原本」，現為館藏編號 03966 之《水經注箋》，參見《胡適日記全集》冊 8，頁 257。

¹⁶ 《胡適日記全集》冊 8，頁 183。

¹⁷ 胡適在 1947 年 3 月 27 日日記中曾自述這本由王重民為他帶來的《水經注》是他購買最後一本，《胡適日記全集》冊 8，頁 277。但實際上 1953 年 8 月 17 日，胡適致楊聯陞函卻又提到他從毛子水處得到一部朱謀埠校的《水經注箋》。「胡適致楊聯陞函」，1953 年 8 月 17 日，收入胡適紀念館編，《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 年），頁 175 至 175 頁。

¹⁸ 《胡適日記全集》冊 8，頁 361。

¹⁹ 本書為熊氏朱墨筆校改。9 行、行 20 字、注文小字雙行、字數同、單欄。共 40 卷，41 冊，現藏於國家圖書館，館藏編號 03970。

²⁰ 胡適編，《胡適手稿》第五集，卷二（臺北縣南港鎮：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1966 年），頁 462-490。

另外，有關央圖館藏《直隸河渠書》，²¹ 早期學界多以為係清代地理學者趙一清撰、戴震手刪底稿本。但經過核對，胡適在 1948 年 11 月 11 日（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First World War ,1914-1918 年)「停戰日」的三十週年紀念)的晚上，他完成初步的考訂，主張《直隸河渠書》全書應為二十三冊九十二卷，而作者應為學養俱豐的直隸總督方觀承。至於世人所稱之撰者趙一清或修訂者戴震只參與部分而已，譬如冊一衛河七卷、冊二漳水十一卷、冊三滏水三卷、冊四大陸澤五卷，他肯定為戴氏定本清本，至於冊五寧晉泊，只有 20 頁不到、冊九可能戴氏修改處，但未肯定。總之，趙一清與戴震都只是幫助方觀承整理修訂的學者。經過多年修改，1953 年，胡適正是將研究發表〈記中央圖書館藏的《直隸河渠書》稿本二十六冊〉，刊載於《大陸雜誌》。²²

二、從研究趙一清等人，居間為央圖薦購戴震手札

在考訂《直隸河渠書》作者之同時，胡適不僅對於趙一清、戴震等人的學術造詣感興趣，而且似乎非尋得第一手資料不可。有關戴震的著作，除校勘以外，根據《經韻樓集》戴氏弟子段玉裁在《經韻樓集》之記載，嘉慶 19 年(1814 年)他曾將戴氏手札 15 件彙為一冊，名為《東原先生札冊》，²³ 或許胡適在 1946 年以前也讀到同樣的線索。因此，同年 5 月 31 日他向曾任南京偽政府的前中央大學教授陳桂尊，有關《東原先生札冊》的下落，²⁴ 方知該冊諸札曾由安鍾祥家族收藏，後歸陳桂尊，戰後則歸餘杭章勁宇所有。這位章氏為民國文人章太炎之堂弟，為蘇杭活躍之收藏家。胡適追尋戴震手稿年餘，終於獲知下落。1947 年 9 月 1 日，章勁宇帶著《東原先生札冊》、清代樸學家手跡二冊、戴子高手札一冊、黃生寫屏條一幅、敦煌寫本佛名經彩圖一卷，但章氏「索價甚奢」，胡適只好打消收買的妄想。²⁵

²¹ 本書現藏於國家圖書館，館藏編號 03992。為墨筆點校、朱筆校改。今存卷一至卷九十四。冊數應為 26 冊。

²² 〈記中央圖書館藏的《直隸河渠書》稿本二十六冊〉，《大陸雜誌》，7:3（1953 年），頁 1-5。

²³ 劉昭仁，《戴學小記—戴震的生平與學術思想》（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頁 313。

²⁴ 《胡適日記全集》冊 8，頁 238-239。

²⁵ 《胡適日記全集》冊 8，頁 304。

章勁宇所擁有之《東原先生札冊》至抗戰結束後，其內容包括戴震手札 11 封、孔洪谷手札 1 封，戴震子手札 1 封，合計 13 封，未附與戴震族第戴漁卿家之家信。而手札 11 封之中，胡適認為最可貴的是戴震在乾隆 42 年(1777 年)所書論理與欲，長約一千字，由戴氏清楚的敘述其思想哲學的主要論點。這段文字經胡適將其與段玉裁所撰《戴東原年譜》比較，《年譜》所載書札內容不到百字，而且有誤刪誤改之處甚多。而戴氏最後一件書札作於乾隆 42 年 5 月 21 日，至 5 月 30 日他就棄世。孔洪谷曾信給段玉裁，描述最後的情形，時間上與書札描述吻合。²⁶ 由於胡適甚為重視這份手稿的價值，因此他請央圖蔣復璁館長向章勁宇交涉，最後終於在 1947 年 9 月底購得。²⁷ 1948 年 5 月 4 日，胡適完成〈中央圖書館藏戴東原與段若膺手札跋〉；〈戴子高手札跋〉，將文獻之價值揭示，同時也標誌書札中戴氏長信在清代思想史中的地位。《東原先生札冊》入館後改名為《戴東原手札》，不分卷，今館藏編號為 20405。1956 年，教育部中華叢書委員會將《戴東原手札》影印後，採線裝方式，並改以《戴東原戴子高手札真蹟》為名出版。

胡適對於手稿信札的認知，並非僅透過文本內容，如字體的書寫的姿態，亦是判斷創作年代的參考依據之一，如胡適來臺後，研究乾隆七年 (1742 年)趙一清詩稿手迹，他認為相較於《水經注》寫本，則《水經注》字體更顯成熟老練，當寫定在較晚的時期。不過，這份詩稿原件，並未如胡適所言典藏於央圖屬購自章勁宇的「清代學人手迹」。²⁸

三、宋寶祐本《五燈會元》版本鑑定，從誤解和刻到支持宋槧

胡適對於佛教大規模的研究，始於 1924 年他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時撰寫《中國禪學史》。因此，他對於佛教經典與文本，特別是禪宗一脈，別有見的。而他與央圖館藏古籍接觸類別型式，版本鑑定最為複雜的，亦當屬佛教著作宋寶祐本《五燈會元》。1960 年 3 月 12 日，根據胡適自述，有人持一部元至正廿四年甲辰(1365)翻刻宋本《五燈會元》兜售，索價新臺幣兩萬元，他懷疑該書應為元版明印，但雕刻甚精，因此囑咐秘書聯繫史語所購買。²⁹ 這部元版明印《五燈會元》最後進入史語所館藏，但卻引發

²⁶ 見胡適，〈中央圖書館藏戴東原與段若膺手札跋〉；〈戴子高手札跋〉，收入《胡適手稿》第一集（中），頁 363-369。

²⁷ 「蔣復璁致胡適」，1947 年 9 月 30 日，「國家圖書館館史文獻」，編號 A0921。

²⁸ 《胡適手稿》第六集，卷四，頁 484。

²⁹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 9 冊（臺北市：聯經出版，1984 年），頁 3213-3214。

胡適對於央圖館藏宋寶祐本《五燈會元》，館藏編號 08960 之古籍版本質疑。3 個月後，胡適先與史語所周法高討論其嘉家藏貴池劉家刻的《景宋景祐本五燈會元》，他認為此本的底本也是元人翻刻本，並不是景祐本。接下來他又從《五燈會元》編纂雕刻的經過，以及央圖館藏宋寶祐本《五燈會元》何以出現「貞治馬兒年正月望書」，強烈懷疑，此書或許是明代翻刻，故推斷劉世珩刻此本稱『景宋寶祐本』是錯的。³⁰

胡氏寫信給央圖蔣復璁館長，希望借出館藏寶祐本，以瞭解是否為宋刻。當時他假定的理由是：1.此版並非寶祐元年(1253 年)元刻本，乃是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 年)福建翻刻寶祐本，因此書上有泉南小比丘彥貞戊申題記：「此錄禪宗至寶也，禪行我朝莫盛如今……」等字樣。而且，其年號干支「戊申」究竟是否為元順帝 28 年即洪武元年(1368)，亦大有疑問，因為在這一年的湯和兵破延平，生擒陳友亮，福建興化、泉州俱降，書版付梓應當不會在戰爭期間進行。2，書中有出現「貞治馬兒年正月望書」，藏書家劉世珩說這是日本年號。但胡適認為泉南和尚圓月何以用日本年號，此應為海疆地區不知政治變化，誤傳年號所致。³¹

見到央圖館藏宋寶祐本《五燈會元》，胡適的懷疑更多，因此，在 7 月 2 日他又陸續向央圖調借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 年)至四十年刊本、明覆元至正 24 年刊本，以及明崇禎甲戌(7 年)曹學佺等刊本。他甚至還提出這三本古籍中的明覆元至正本，其實是元至正廿四年的杭州原刻本。³² 但這些始終無法解答宋寶祐本《五燈會元》何以會出現「貞治馬兒年正月望書」之內容。最後，從字體與刻工等特徵判斷，胡適認為此本定有日本補刻。胡適的諸多疑問，後經與黃彰健討論，得知央圖書館藏有大阪府立圖書館編印的《恭仁山莊善本書影》其屬內藤湖南捐贈之日本覆刻南宋本《五燈會元》，即所謂五山版《五燈會元》。「五山版」係鎌倉至室町，約二百數十年間，以京都五山為中心之日本禪僧所刻書籍之總稱，亦以覆刻宋、元版，為其特色。³³ 同年 12 月 8 日，胡適向央圖再次提出借館藏《恭仁山莊善本書影》、《晦菴先生語錄類要》、《朱子語略》等書。

³⁰ 「胡適致周法高」，1960 年 6 月 7 日，中研院近史所胡適紀念館(以下簡稱胡適紀念館)，館藏編號 HS-MS01-023-018。

³¹ 「胡適致蔣復璁」，1960 年 6 月 16 日，胡適紀念館，館藏編號 HS-NK01-043-008。

³² 「跋中央圖書館藏的明覆元至正本五燈會元」，1960 年 7 月 2 日，胡適紀念館，館藏編號 HS-NK05-184-017。

³³ 「黃彰健致胡適函」，1960 年 7 月 13 日，胡適紀念館，館藏編號 HS-NK05-100-030。

³⁴ 《恭仁山莊善本書影》第廿五件是室町時代翻雕南宋寶祐元年刻的《五燈會元》，胡適將其書影與央圖寶祐刻本，比較其字體、刻工、版心樣式後，他卻認央圖館藏之《五燈會元》，絕非日本五山版佛經。³⁵ 胡適對於寶祐版《五燈會元》的關注一直到翌年 10 月因央圖舉辦宋版圖書展覽，請胡氏歸還《五燈會元》，以便參展，才結束相關研究。

肆、胡適對於央圖的經費援助與贊助

1948 年，國共軍事對峙局勢逆轉，央圖鑑於抗戰時期慘動的經驗，因此早在共軍渡江以前，就已進行遷臺計畫。1948 年 10 月，政府中樞授命杭立武將央圖與故宮博物院等單位精選藏品撤往臺灣。央圖之部分，因蔣復璁館長出國考察，因此運臺圖書乃由曾經參與文獻保存同志會的徐森玉選定，先後 3 批共計 644 箱，由海軍及招商局派軍艦及海輪運臺。³⁶ 1948 年 12 月第 1 批運臺，至 1949 年 2 月 22 日，第 3 批運臺圖書 122 箱，交海軍崑崙艦運抵基隆。第 4 批 200 餘箱因中樞與中共和談而停運，未及運出。從 1949 年 8 月至 1954 年 8 月整整 5 年期間，央圖組織陷入「最為黯淡的時期」，不僅群龍無首，館務渙散，連古籍也談不上整理與利用，直到教育部長張其昀指派蔣復璁於臺北將國立中央圖書館復館，一切經營才回復常態。然而，開館以後面臨的各類改善閱讀環境問題，實非公部門預算所能應付。

為爭取經費，1955 年蔣復璁館長來臺後首度聯繫在美國胡適。當時胡氏在美國主持「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掌握不少經費。因此，蔣氏以低姿態及昔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生的身分，主動寫信至 104 E. 81 St., New York, N. Y., 一方面告知胡適有關中央圖書館在臺復館情形，並為購置圖書及編印善本目錄請款事，請胡氏鼎力支持。³⁷ 這樣的補助方式似乎持續 5 年以上。1959 年央圖為容納圖書，同時強化原為日本神社的建築，於是計畫以原有建築為主，興建中央圖書館右側樓房，向該會爭取 3,000 元美金的補助。³⁸ 同年蔣復璁又透過毛子水、姚從吾等人向胡適聯繫，表明圖書館預算被減去 20 萬元。始各項計畫都不能如預

³⁴ 「胡適致蔣復璁」，1960 年 12 月 8 日，胡適紀念館，館藏編號 HS-NK01-043-009。

³⁵ 《胡適手稿》第 8 集，卷 2，頁 359-360；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 9 冊，頁 3399-3400。

³⁶ 〈臺灣辦事處〉，國家圖書館館史檔案，1948，編號 48。

³⁷ 「蔣復璁致胡適函」，1955 年 9 月 5 日，胡適紀念館，館藏編號 HS-US01-079-025。

³⁸ 「蔣復璁致胡適函」，1959 年，胡適紀念館，館藏編號 HS-NK05-123-002。

定完成。如能在臺北實踐建造堅固的書庫和閱覽室，使存放北溝的善本書，可提取一萬五千冊至兩萬冊來台北，以供此間讀書人使用。因此，他迫切希望持「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能補助美金 3 千元，則他年來所夢想的這件最切實用的事情，便可完成。³⁹ 也許是爲了提高胡適對於支持央圖的重視，翌年蔣復璁請盧荷生及徐誠增女士分別編繕胡適的老師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 約翰杜威(John Dewey)演講與著作目錄，同時計畫出版。⁴⁰ 果然，在 1960 年央圖創設音樂美術輿圖三室，欲購買唱機圖書及輿圖等，請求該基金會補助三千美元，很快就通過審核。⁴¹

另外，在 1958 年胡適到臺灣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蔣復璁也有意透過胡適的影響力，轉向其他政府機關如向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申請補助。由於國科會對於中央圖書館認定爲非專門研究機構，故未經審查直接淘汰，不列入申請補助名單。蔣氏邀請胡適鼎力協助，以解決困境。⁴² 但最後仍未能如願。

伍、結論

胡適與國立中央圖書館的關係，基本上可以說是建立在胡適與蔣復璁兩個人的私人情誼上。早期胡適主要在北京從事研究與教學活動，而央圖則是在 1933 年成立於南京。由於地理位置與典藏無法提供研究者「整理國故」的需求，因此兩者之間，在互動網絡上毫無交集。但隨著央圖在 1940 至 1941 年搶救淪陷區古籍的壯舉，帶來豐富的典藏，擔任駐美大使的胡適開始有機會參與搶救國寶之計畫。雖然，到最後古籍赴美移存並未能實踐。

1947 至 1962 年期間，胡適開始有機會運用央圖館藏古籍，使其在中國哲學史、清代學術與乾嘉地理學研究等領域，能夠掌握相對完整的版本比較。見其學術惟精惟一之具體表現。而胡適在整理國故的過程中，其運用傳統版本學考證，加上運用海外文獻作爲校勘之比較，實已超越當時學術境界。在鑑定央圖館藏版本的過程中，胡適以科學研究精神加上邏輯判斷，跳脫傳統翻案文章的無趣，不僅豐富古籍研究的樂趣，也讓世人

³⁹ 「毛子水致胡適函」，1959 年 8 月 26 日，胡適紀念館，館藏編號 HS-NK05-009-003。

⁴⁰ 「蔣復璁致胡適函」，1960 年 1 月 25 日，胡適紀念館，館藏編號 HS-NK05-123-003。

⁴¹ 「Chiang Fu-tung to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1960 年 8 月 25 日，胡適紀念館，館藏編號 HS-NK05-123-005。

⁴² 「蔣復璁致胡適函」，1960 年，胡適紀念館，館藏編號 HS-NK05-123-004。

了解到央圖典藏古籍之價值。

最後，如前所言，胡適與國立中央圖書館的關係，基本上可以說是建立在胡適與蔣復璁兩個人的私人情誼上。但雙方在私領域方面的互動，本研究囿於可供參考之線索與史料不足，無法繼續探究，藉以瞭解胡適為何願意長期互持央圖。

參考資料

史料、檔案與手稿

1. 檔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胡適檔案」

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檔案」

國家圖書館，「國家圖書館館史文獻」

2. 胡適相關史料集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市：聯經出版，1984年）。

胡適紀念館編，《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

胡適編，《胡適手稿》（臺北：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1966年）。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臺北：聯經出版社，2004年）。

專書

劉昭仁，《戴學小記—戴震的生平與學術思想》（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

論文

胡適，〈中央圖書館藏戴東原與段若膺手札跋〉；〈戴子高手札跋〉，收入《胡適手稿》第一集（中），頁363-369。

胡適，〈記中央圖書館藏的《直隸河渠書》稿本二十六冊〉，《大陸雜誌》，7:3（1953年），頁1-5。

蔣復璁，〈追憶胡適之先生〉，《文星》9:5=53（1962），頁9。

盧錦堂，〈劫餘玄覽幸遷來〉，收入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編，《搶救國家珍貴古籍八十種圖錄，1940-1941》（臺北：國家圖書館，2013年），頁27-29。

蘇精，〈抗戰時祕密蒐購淪陷區古籍始末〉，《傳記文學》35:5，頁113-114。